

◀ (上接 10 版)

馆学习。参加经文科举考试及第者,授予官职。

如同明朝文官政府、科举制度培养出士子阶层,朝鲜的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也培育出一个相同的士子阶层。这是朝鲜在政治上有中华认同之外,文化上形成中华认同的原因所在。

在推行以儒家思想治国的过程中,朝鲜世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朝廷中,世宗设置集贤殿,对集贤殿学士赐暇读儒经。制定国家五礼体系(吉礼、凶礼、军礼、宾礼、嘉礼)、士庶家礼(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祭礼)。编撰《三纲行实图》,以儒家纲常伦理教化民众。

由于朝廷崇儒,大批儒生进入官僚集团,形成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阶层,史学家称之为“勋旧派”。勋旧派的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遵照朝鲜王的命令推行文化政策。代表性学者是郑麟趾(易斋),他是理学家权近(权溥后人)的传人。

与勋旧派相对,还有一批儒生以道统自任,被称为“士林派”。士林派祖述郑梦周,构建出“郑梦周(圃隐)—吉再(治隐)—金叔滋(江湖)—金宗直(毕斋)—郑汝昌(一蠹)、金宏弼(寒暄堂)—赵光祖(静庵)”的道统体系,并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提出道学的政治理想。面对朝鲜前期王位更迭及官僚政治中的违反纲常、不道义的现象,他们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,勇于批判。正因如此,士林派遭受朝鲜王及勋旧派的政治迫害,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,遭受多次士祸。金宏弼、赵光祖都死于士祸中,金宗直也被剖棺斩尸。

16世纪后半期是朝鲜程朱理学的真正形成期。从这一时期开始,士林派成为政治上的主导力量。朝鲜儒生对程朱理学的理解水平大幅提升,已经可以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,并形成了以四端七情论为论争中心的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。

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李滉(退溪)。李滉被看作是正统朱子学的维护者。他编撰了《朱子书节要》,成为朝鲜儒生研习朱子学的基础。他所撰写的《宋季元明理学通录》以朱子学为正统对宋明儒学史进行了梳理。李滉对明朝的学术潮流十分敏感,对于刚刚兴起的阳明学,他撰写了《传习录论辩》对《传习录》逐条驳斥。对明朝哲学家罗钦顺的主气论,李滉撰写《非理气为一物辨证》进行批判。因为李滉的巨大威望,阳



▲安珣(晦轩),最早在高丽提倡程朱理学

▶藤原惺窝,师从僧人九峰,还俗后从事朱子学著述,被视作日本朱子学的首创者



藤原惺窝肖像



▶山崎闇齋是17世纪日本重要的朱子学家

山崎闇齋肖像

明学被朝鲜儒学者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。作为士林领袖,李滉尊重学校,奏请朝鲜明宗下赐绍修书院匾额,倡导了朝鲜的书院讲学之风。在朝鲜朝后期,书院成为比成均馆、乡学更加重要的士林活动中心。因为退溪的提倡,朝鲜的书院讲学之风的兴起,与明朝陈献章(白沙)之后书院讲学之风相比,也只是略晚而已。

李滉自己的思想体系总结在晚年所作的《圣学十图》中。《圣学十图》以图像形式表达他对天人关系、人伦规范的结构性的系统理解。这种表达形式是朝鲜理学的独创。

李滉最有名的论说是“四端七情论”。这是1559年到1566年间,李滉在与奇大升(高峰)的论争之中提出的。是朝鲜儒学对性理学的发展。李滉将“四端”与“七情”相对,认为“四端理之发,七情气之发”。李滉强调理的根源性,提出“理自到说”。李滉的理论暗含着将人心与道心对立的趋势。

畿湖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李滉(栗谷)。李滉去世后,成浑维护李滉的观点,就“四端七情”问题与李滉发生论辩。李滉提出“气发理乘一途说”,认为“发者,气也;所以发者,理也”,四端七情都是气发,理蕴含于气中。李滉认为四端为七情中之善者。李滉的理论把人心与

道心统一起来。

作为理学家,李滉思想的代表作是《圣学辑要》,以《大学》体系综合儒学。对朱熹的《小学》加以注解,撰写《小学集注》。在普及理学方面,李滉撰写了《四书谚解》《四书小注》。与李滉一样,李滉也重视学校建设,他撰写了初级教育教材《击蒙要诀》以及规范学校教育的《学校模范》。作为士林派在政治上的核心人物,李滉还提出振纲纪、革弊端、安民生的改革要求。

由于李滉、李滉在性理学、尤其是“四端七情论”上对立,其各自门徒形成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。而按照朝鲜党争的分野,岭南学派多属于东人党,畿湖学派多属于西人党。学派的分裂与政治上的党争又结合在一起,造成了朝鲜后期政治与社会的分裂。

16、17世纪明朝正是阳明学兴起的时候,朝鲜却以“四端七情论”为中心坚持在朱子学的理路上前进。虽然朝鲜也有人学习阳明学,如许筠(蛟山)、张维(溪谷)等,但朝鲜理学家的主流仍然是批判阳明学。万历二年(1574年),王阳明配享文庙,这象征着官方对阳明学正统地位的承认。同年,朝鲜理学家许葑出使明朝,在国子监中猛烈地批判阳明学为异端。援朝战争中,明朝经略万世德

要求朝鲜也让陆象山、王阳明配享文庙,但是遭到尹根硕等人的反对。这些都反映了16、17世纪中华文化圈内虽然都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共识,但是各自的差异也开始出现。

与朝鲜不同,日本的儒学传承主要在博士家中,以汉唐注疏为主。朱子学形成后,主要是经由禅宗中的临济宗传入日本,禅僧玄惠法印、岐阳方秀、桂庵玄树都曾宣传、化用朱子学。而将朱子学发扬光大的则是生活在16世纪后半期的藤原惺窝。

藤原惺窝师从僧人九峰,还俗后从事朱子学著述,被日本学者看作是日本朱子学的首创者。藤原惺窝正处在日本由战国走向统一的时代,前有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,后有德川家康。因而,藤原惺窝提倡以儒家五伦、五常作为日本社会的伦理准则,为统一的政治统治提供思想基础。因而,藤原惺窝重视四书、五经,并以朱子学的理论阐述伦常纲纪。藤原惺窝简化了朱熹对于“理”的论证,将“天道”、“性”、“理”三者视为同一,以贯穿在他的理论体系中。

据林罗山《惺窝先生行状》,藤原惺窝“读圣贤性理之书,思当世无善师,而忽奋发欲入大明国,直到筑阳泛溟渤,逢风涛漂著鬼海岛。先生常慕中

华之风,欲见其文物,虽然其盛志不遂而归,先生以为圣人无常师,吾求之六经足矣”。藤原惺窝虽然最终没有来过明朝,但是对于明朝一直都很仰慕,这是源于他所习之朱子学。

林罗山是藤原惺窝的弟子,他生活在16世纪末期与17世纪上半期,相当于万历、隆庆、天启、崇祯年间。林罗山以独尊朱子著称于日本哲学史。他批判陆九渊夹杂老庄之学,更是排斥佛学。德川幕府建立后,林罗山是幕府统治合理性的主要论述者。林罗山援引朱子学论证幕府统治下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。虽然在思想上,林罗山独尊来自中国的朱子学,但是在政治上他对明朝评价不高,专门仿照贾谊《过秦论》而写有《过明论》。

17世纪,日本还有一位重要的朱子学家——山崎闇齋。与林罗山注重朱子学义理为幕府统治作论辩不同。山崎闇齋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在对朱子学文本的注释与讲解上,以及对朱子学的传播上。自山崎闇齋之后,朱子学在日本大行。但是,晚年的山崎闇齋转信神道,成为垂加神道的创立者。正是在16、17世纪朱子学的传播下,日本学者对中国思想的认同,转而形成对“中国”的认同。

与朱子学在朝鲜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不同,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虽然重视朱子学,但是朱子学尚未取得独尊地位,因此,17世纪时,阳明学也开始在日本得到传播,其重要人物是被称为“近江圣人”的中江藤树。中江藤树对林罗山的观点多有批驳。在中江的思想体系中,他十分注重“孝”,认为孝是天、地、人三才的至德要道,并将孝与心法、太虚、修齐治平相联。中江藤树的弟子熊泽蕃山调和江的阳明学与林罗山的朱子学,他脱离了中江藤树以自我修养而明德的内在心性论路径,转向政治王道主义。17世纪的日本阳明学对江户时代影响甚大。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起义领袖大盐平八郎极为崇尚中江藤树,称“受其赐亦厚矣”(《儒门空虚聚语》)。

程朱理学在朝鲜、日本的传播及其在地化,既使14—17世纪东亚读书人有了思想的共识,形成同一个文化圈,又使朝鲜、日本的朱子学在16、17世纪呈现出地方性的发展态势。1644年明朝的灭亡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,基于理学思想的“华夷之辨”,出于对中国文明的认同,朝鲜自居为“小中华”,而日本儒者也将本国视为正统。

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)

▲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李滉(退溪)